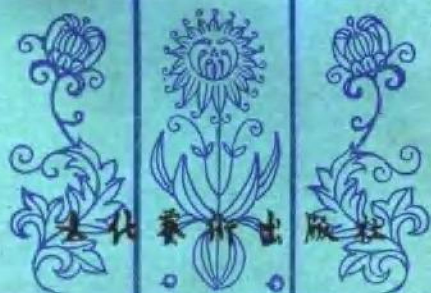


世界艺术与美学

第六辑

美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界艺术与美学

第 六 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世界艺术与美学》编辑委员会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界艺术与美学

第六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07,000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800册

书号10228·187 定价2.00元

目 录

结构主义：“赞成”与“反对”(一)

〔苏〕B·Π·克鲁托乌斯 编

佟景韩 译

译者前言.....	1
结构符号学文艺学研究问题商榷〔苏〕B·Π·克鲁托乌斯	3
符号学原理.....〔法〕罗兰·巴尔特	24
评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研究观点〔保〕赫里斯托·托多罗夫	70
文学艺术在先进文明中的反叛.....〔法〕吕·戈尔德曼	87
韩树站 译	
文化系统中的艺术.....〔苏〕M·C·卡冈	118
凌继尧 译 李实 校	
美学——艺术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苏〕尤里·鲍列夫	158
冯 申 译 高叔眉 校	
艺术解释学与作品分析论.....吴 火	194
电影与符号学：若干联系点.....〔英〕彼得·沃伦	215
谷时宇 译 崔君衍 校	

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

.....〔法〕《电影手册》编辑部 239

陈犀禾 译

电影形象，它的本性和界限(续完)〔苏〕维塔里·日丹 301

于培才 译 富 澜 校

戏剧为了学习.....〔德〕贝·布莱希特 330

聂 晶 译

对莎士比亚的“间情”处理.....〔德〕贝·布莱希特 343

狄 尔 译

苏联剧作中的“新浪潮”.....陈宝辰 陈 铎 摘译 353

编 后..... 418

结构主义：“赞成”与“反对”（一）

〔苏〕B·Π·克鲁托乌斯 编

佟景韩 译

译者前言

苏联进步出版社出版的《结构主义：“赞成”与“反对”》(1975)一书，是一部介绍有关结构主义文艺研究问题论争的文集。全书约三十万字，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问题与方法”，选录正面阐述和运用结构方法、符号学方法和信息论方法的文艺研究著作八篇，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作者有被称为结构主义文艺研究“开路先锋”的捷克学者扬·穆卡洛夫斯基(1891—1975)、俄裔美籍语言学家罗·雅克布逊(1896—)和法国学者克·列维-斯特劳斯(1908—)，有当代西方结构主义文艺研究的主要人物法国学者罗·巴尔特(1915—)，有被称为法国结构主义“年轻一代”代表的保裔法籍学者茨维丹·托多罗夫(1939—)，还有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阐述和运用这些方法的捷克学者伊尔日·列维(1926—1967)和波兰学者亚诺什·斯拉文斯基。下编“围绕结构主义的争论”选录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结构主义提出批评和异议的论文，也是八篇，但篇幅较小，作者是捷克学者库尔特·康拉德(生于1908年，1941年被法西斯杀害)、拉吉斯拉夫·施托尔(1902—)，保加利亚学者潘台莱扎列夫(1911—)、赫里斯

托·托多罗夫，法国学者夏·帕兰、若·穆瓦纳，民主德国学者罗·魏曼。苏联学者克鲁托乌斯的前言说明了文集的编选原则和内容概要，同时也就一些实质性问题发表了见解。

这里译载的七篇材料，第一篇是该书的前言，其余六篇有三篇属于该书的上编，有三篇属于下编。鉴于结构主义文艺研究在我国学者和文艺界中已经引起注意，我们希望这些材料会有助于具体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其中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篇幅最长，对于理解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理和结构分析方法与符号学的关系很有帮助，如果结合赫里斯托·托多罗夫的批评文章来读，还可以减少一些理解上的困难。

正如许多读者一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结构主义者著作的费解和难读，这种困难一部分是由于结构主义者所使用的各种概念的特定涵义，包括“本文”、“报道”、“能指”、“所指”、“意指”、“确指”、“泛指”、“意义”、“涵义”、“共时”、“历时”、“超句”和“句下”等等的专门用法，以及借自信息论、控制论和数学的许多术语，如“模型”、“形式化”、“信路”、“信码”、“信道”、“平均信息量”（“熵”）、“矩阵”和“集”等等；而更多的困难还是因为一般读者在阅读这些著作之前，对于与之有关的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 and 一般科学发展情况往往缺少必要的了解，因而难以掌握结构主义者思路的来龙去脉。兼之许多结构主义的语言分析和诗学著作都是从某一种语言文字的作品本身（“本文”）出发，因此，例如用法文写的东西，在英文、德文、俄文中有时就难以完全表达，而译成中文就更加困难。所以译者很同意一本介绍结构主义的中文著作作者^①的意见：有条件的读者，

^① 高宣扬：《结构主义概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第3—4页。

最好进一步阅读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主要著作的原著。这位作者的另一个意见尤其值得注意：即便是结构主义的创立者也不希望人们把结构主义绝对化或神秘化。他引用了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序言中说的一段话：“我们倒不如说，在人文科学（因而也包括人类学）中，任何一个假设都只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即它能够比它所取代的前一种假设更多地考虑到事实。这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可以一直有效到那样一个时期——到那时，另一个新的假设在同一方向上取得了新的成果。”接着他就指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上往往流传着这样一些弊病，即当某一社会思潮出现的时候，有很多人并不愿意下苦功夫加以认真的分析和比较，辨别其真伪，鉴别其中所可能包含的真理的程度，而是盲目地追随之。他说的“当今社会”指的是西方，但不能否认，在我们这里有时也会看到类似情况。《结构主义：“赞成”与“反对”》一书的宗旨，如它的前言所表明的，正是要给读者提供一部分可供进行分析比较、辨别真伪和了解结构主义文艺研究的有效性与范围的参考材料。因此，在我们对结构主义文艺研究发生兴趣，而有关材料介绍又很缺少的情况下，这些材料的介绍也许多少会有一些用处。如果条件允许，该书其它各篇我们亦将陆续译出。

文中以方括号表示节略的地方，均系该书原有的节略部分。

结构符号学文艺学研究问题商榷

〔苏〕B·П·克鲁托乌斯

关心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苏联读者想必了解，关于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这两门学科中的结构主义，近几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国外一直也在热烈讨论^①。所以，这部文集的出版是非常适时的。在资产阶级的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中，结构主义成了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以及苏联的艺术研究中，用结构论方法研究艺术的试验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来认真讨论一下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特殊学科内容及其各种不同解释的理论前提和结论。

这部文集的意义首先是在于：它对国外学者多年以来关于在文艺学中采用结构方法的基本可能性、界限和前景的讨论作了若干总结；同时，它也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立场出发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为了客观地介绍结构主义之争的实质及其参加者的基本立场，编者在文集的编排上采取了“赞成”与“反对”的分法。我们知道，对这种性质的出版物，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评论尼·亚·鲁巴金的《书林概述》一书时说过：“希望作者多多采用面向各知识领域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的方法”。列宁强调说：“这样才能使介绍的东西既准确而又完整，并且保持客观性；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折衷主义和掩饰论战的毛病。”^②不过，必须立即提醒读者，对本文集的内在的论战性不能作出简单的理解（上编“赞成”，下编“反对”）。许多文章的内容实际上更为复杂，更为辩证。至于全书，则应该说明，“赞成”与“反对”的原则亦非仅见于书名，而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文集的全部内容。本书的基本特色亦在于此。上编收录了著名西方结构主义者（雅克布逊、巴尔特和列维-斯特

① 其中，匈牙利《赫利孔山》杂志 1968 年第 1 期出过讨论文学研究以及其它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专号，1973 年第 2—3 期讨论了“文学研究与符号学”这个专题。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57 页。

劳斯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在下编受到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分析。

本文集介绍的是当代国外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所收著作主要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作品。编者只有两次打破“当代”的编年范围:上编收了穆卡洛夫斯基为什克洛夫斯基《散文论》^①捷译本写的一篇序言;下编收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康拉德的两篇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关于新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札记》和《再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即对穆卡洛夫斯基的“批判的批判”。这两位作者的独特对话还是三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但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结构主义方法论在西方文艺学中的形成所作的第一次反应,因此,了解一下这个反应对读者来说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此外,这两位作者还各以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明了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当代结构主义同所谓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学派”的遗传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什克洛夫斯基之成为这一对话的“无形”的第三者,决不是偶然的。在二十年代,著名苏联文学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是形式主义学派的领袖之一。其《散文论》一书(1925)就是该派的一部纲领性著作。据穆卡洛夫斯基的意见,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产生是彻底克服诗歌语言研究会(其成员都是形式主义学派人士)的形式主义偏向的结果。然而,《序言》的内容本身表明,情况毋宁说刚好相反。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者康拉德对穆卡洛夫斯基观点的批判是颇有说服力的。后来,穆卡洛夫斯基(而且也有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和彻底的变化^②。但是,我们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另一点。在许多当代西方结构

① 该书俄文原名为《关于散文理论》。——译注

② 详见本书注释,第435—439页。

主义者的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形式主义的因素和影响，但这还不足以成为把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学研究同二十年代的形式主义混为一谈的理由。

语言学专家雅克布逊是当代西方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公认权威之一。文集收选了他的广为人知的《语言学与诗学》一文。雅克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合写的《评波德莱尔的〈猫〉》一文，作为把结构主义方法论具体运用于诗歌本文分析的一个范例收入文集。

与雅克布逊、列维-斯特劳斯和穆卡洛夫斯基的纲领性著作密切相关的是当代法国结构主义者——巴尔特等人的研究。把这些作者的著作收入文集一事本身，以及文集批判部分对他们的观点给以特殊的注意，都是有原因的。法国各门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以人种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为主要代表，近几年来发展迅猛。在著作界，代表法国结构主义的文学研究这一分支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巴尔特以外，还有格雷马、克莉思特娃和德雷达等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注意^①。法国共产党员、哲学家吕西埃·西夫曾就此指出：“众所周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客观和全面的评价，这当然不排除在他们中间就当代结构主义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争论和讨论。”^②文集下编选载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帕兰和若·穆瓦纳的文章。同时广泛介绍了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著作，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拉·斯托尔和伊尔日·列维，保加利亚的潘·扎列夫和赫里斯托·托多罗夫，德意志民

① 法共理论刊物《思想》第135期（1967年10月）专门讨论了结构主义，已译成数种文字。

② 吕西埃·西夫：《论结构主义，关于法国思想生活一个方面的札记》，见《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1年，第6期，第80页。

主共和国的罗·魏曼，波兰的雅·斯拉文斯基。

本文集不是国外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一般文选。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一本按一定观点组织起来的完整读物。选材和编排服从一个目的：着重揭示当代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弄清运用结构方法分析艺术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尽管在篇幅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限制，本书还是可以使人相当充分地看到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本质。因此，文集没有重复其它阐述结构主义艺术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局部问题的译著^①，而是对这些译著作出了重要的补充。

考察文艺学的当前问题，必须联系现代科学知识的一般发展，考虑到现代科学知识的主导倾向和规律性。各个专门学科在趋向一体化和综合的同时，也正在深刻地分化，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现今阶段的一个特点。因此，每一门学科都在力求自我确定，力求明确自己的特殊对象和研究方法，力求建立一整套相应的范畴等等；但是，由此也产生了各门学科的相互渗透倾向。现代科学日益深刻认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在各种不同的看似相距甚远的学科部门和知识领域之间“搭桥”。处于各门学科交接地带的边缘区域成为最积极的研究探讨的场所。在同一客体的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发现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的相互作用；因此，某一具体对象或现象的特殊复杂性，已经不是利用邻近学科的材料和方法来研究它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综合研究复杂客体包括社会客体的方法日益广泛传播开来。

作为二十世纪科学的特点，所有这些以及其它现实的过程，不能不也触动文艺学（继语言学和人种学一类人文科学之后）。而

^① 可参见文集《符号学与艺术测量学》，1972年，莫斯科，和平出版社。

这本身又把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提上了首位。有关结构符号学艺术研究方法讨论的问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关于结构主义的论争，其要点之一就是把邻近学科的方法运用于艺术分析的合理性的问题。仅仅一般地这样提出问题未必会引起什么异议。但如果考虑到，这里具体说的是把结构语言学、一般系统论、符号学、控制论、信息论和数学等等的方法运用于人文科学领域，回答则可能远非众口一辞。同时，还有一种倾向看来也很明显，就是人们所说的“邻近”学科，已经不只是，有时还不主要是同艺术研究有亲缘关系的“传统”学科（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而还有近几十年来被科学技术进步行程推上前列的那些新的知识领域。这些最新的科学是一些具有很高的科学抽象程度，具有极其广泛的（尽管不是先验地决定的）应用领域的学科。而且，这都是些“技术化”的科学。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看来不能不考虑到，现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具有历史的具体性质和它的发展阶段。“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①列宁在概括进入科学技术革命时代以后的认识发展规律时，曾经指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 的强大潮流……在二十世纪……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②无论如何，不考虑各门科学走向一体化和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的进步趋势是不行了。

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奠基性的哲学方法相比，各种结构论学科的方法是专门的、局部的方法，这个事实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无可怀疑的。为了强调这个根本的和必要的区别，人们有时提出，对科学术语也要作出相应的校正。包括以此为根据，把一切非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归入“具体方法”、手法一级。我个人认为，最好还是订正一下问题的提法本身。在术语方面，我们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按照这一传统，科学方法这个概念是同寻求新结果、亦即从已知转向未知相联系的。订正术语必须从下面这一点出发：以上述各种专门科学为依据的各种结构论研究，是否导致了新的、前所未知的事实的确立，是否导致了新的、非陈腐的概括。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哲学方法与专门科学的方法或具体方法当然不能混同，但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联系也是不能忽视的。具体科学的方法是哲学方法的一种具体化。看来，正因为如此，解决有关在文艺学中运用邻近学科方法的问题，不只是文学研究或艺术研究专家的局部问题、内部问题。

在伊尔日·列维的《信息论与文学过程》一文中，触及了与术语有关，但决非纯术语性质的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利用邻近学科的那些科学概念，是否就是术语的简单折合，就是简单地把众所周知的艺术现象和因素改变一下名称呢？该文作者认为，“……替换传统的文学研究术语带来方法论观点的改变，即使在我们暂时还只是试图形成基本概念系统的地方，它也可能得出新的结果。”^①

显然，掌握新术语既可以有形式主义的做法，也可以有非形式主义的做法。列宁嘲笑过阿芬那留斯的“‘生物学的’玩意”，但也举过完全不同性质的例子，指出恩格斯“**掌握了能量这个对他说来是新的术语**”。而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的是，如列宁所说，

① 见本书第295—296页。

“恩格斯善于吸收新术语来丰富自己的唯物主义”^①。

读者无疑会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文集上编的文章作者都是文艺学以及语言学、人种学等等方面的理论化专家。作为专家，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立足于本门学科的现实需要，探求了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途径，探求了克服在认识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困难的途径。作为理论化专家，他们不能不从一定的哲学理论前提出发，并以种种方式作出具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概括。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先解决一般的问题，就去着手解决个别的问题，那么，随时随地都必然会不自觉地‘碰上’这些一般的问题。”^②这一点，对于美学问题来说，同政治上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同时，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文艺学中的结构论方法现在也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得到运用和论证。由于这个原因，要用同一个术语来表示那些哲学理论前提非但各不相同而且适相对立的研究，是行不通的。

以上所说各点，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西方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尤为重要。尽管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属于具体科学一级的理论，因而不能把它同哲学唯心主义的结构主义混为一谈，但它本身毕竟还是受到后者以及其它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研究的结构主义中，可以看到康德主义（先验主义的观点等）以及新康德主义、特别是由马（瓦）尔堡学派（卡西勒等人）^③所发展的新康德主义“逻辑提斯”唯理主义变种的影响。现象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9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476页。

③ “……卡西勒是及时地注意到科学的这一重要特点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之一，……即功能结构方法的运用”，包括在艺术研究中的运用（E. Я. 巴辛：《语义学艺术哲学》〔批判分析〕，1973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第37页）。

学一直是唯心主义思想渗透结构主义的另一来源。(格式塔心理学也是沿着胡塞尔的思想轨迹发展的,它对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西方文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新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把各种专门科学,首先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乃至在科学研究中采用的某些逻辑方法程序绝对化,使西方结构主义者的某些一般原理和结论接近了新实证主义的思想。由于任何一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都具有客观的相互依赖性,这种极端性时而导致不合情理地缩小或者扩大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还经常出现科学抽象对象(逻辑结构、“构成”)的本体论化,这在新实证主义中是相当常见的。至于在法国流行起来的、对具体科学的结构主义发生一定影响的哲学结构主义,则有必要看到,按照哲学专家的看法,“在法国,实际上它占据了在该国不具影响的新实证主义的位置”^①,它没有提出任何有创见的结构“哲学”,而只是集中了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乃至庸俗唯物主义的各种变体^②。

表现在西方文艺学结构主义者的论点中的各种基本哲学影响,其性质大体如此。

对象的特性是当代文艺学结构主义的一切理论构成的出发点。西方结构主义者要求科学地认识艺术的特性。这个要求的实际内容,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可能是极其各不相同的。

① M.H.格列茨基:《结构主义:基本问题及其解决程度(漫评)》,见《哲学研究》杂志,1974年,第4期,第53页。

② 参见M.H.格列茨基:《结构主义概念中的人和自然》,见《自然》杂志,1974年,第7期,第85页。

如所周知，按照二十年代形式学派人士的意见，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只应服务于一个目的——揭示它所研究的对象本身的特性。形式主义者把艺术作品同与之相应的非艺术的现实加以对比，从中发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惰性的、消极的、非本质的和无个性的“材料”，一个是艺术家对它进行加工的“手法”。据他们认为，后者就构成其作为艺术现象的特性。艺术作品就是手法的总和。不应忘记，形式主义者就是在艺术的“特性”这一口号下，使文学作为一个似乎绝对独立的、内在的“系列”，同其它社会精神文化形式以及文学的认识论基础和社会经济基础脱离开来。

应当说明，文学艺术的特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用逻辑的、概念的手段来表述这种特性？当然，文学科学不能只限于郑重宣布一个关于文学特性的命题，即一个具有抽象的普遍形式的真理。因此，学者们之注重研究艺术作品的具体要素（高级和低级层次的都包括在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不妨提一下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提要》的一个著名论点：“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的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東西的全部丰富性！）！！好极了！”^①

在加深认识和揭示文学的特性方面，艺术作品的结构分析也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著名文学研究家魏曼说：“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表明的那样，‘结构’这个概念，亦即在特性上‘对象化的’功能，完全可以运用于分析现实主义的艺术。”^②这一公允的说法为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赞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页。

② 见本书第416页。